

习近平新时代外交思想阐释

## 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 视域下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王亚杉

**内容提要：**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经历一场理论的“去殖民化”和“跨本体论”转向，以对抗西方现代性霸权话语体系下的整体化与单一化发展逻辑。杜塞尔的解放哲学思想从“外部性”的伦理政治立场出发，重新思考被殖民与边缘化群体的主体性地位，提倡一种“跨现代”形式的内在自主、自我解放。基哈诺对殖民性的批判研究阐释了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殖民地之间的纠葛，主张从多重维度破除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殖民主义权力矩阵。埃斯科瓦尔的“多元世界模型”实现了现代性发展从全球化逻辑向多元宇宙并存的星球化概念的转型，凸显了人类社会价值多元、自主与可持续发展的美好愿景。三位学者思想中蕴含的多元性、动态性、关系性与实践性等属性挑战了现代性主流本体论的霸权基础，开辟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研究范式，为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的哲学视角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拉美马克思主义 本体论 去殖民化 中拉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王亚杉，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5) 03-0019-17

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是拉美学者结合拉美地区独特的历史、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背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套理论体系。该哲学流派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运行体系与现代性发展逻辑的同时，融合了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拉美社会斗争史的思考，希望借助探索更为公平正义的社会共同体，最终实现对边缘群体和被压迫群体的解放。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蕴含着强烈的反殖民化、本土化以及解放色彩，更在理论上表现出延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与革命性特征，对发展拉美社会主义运动、促进中拉关系的深化及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为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omingo Dussel Ambrosini）、阿尼巴尔·基哈诺（Aníbal Quijano）以及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三位学者均对西方现代性模式下殖民性与剥削性的本质展开激烈批判，并通过理论的“去殖民化”和“跨本体论”转向挑战现代性主流的认识论基础。目前，国内学界对上述三位学者的主要思想已有少数译介和评述成果，但对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及现实意义尚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本文通过提出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的共同体“外部性—去殖民性—多元化”理论框架，揭示其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之间的理论共振与价值认同，为进一步推动中拉关系行稳致远、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

## 一 拉美解放哲学的共同体“外部性”

恩里克·杜塞尔是阿根廷裔墨西哥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拉美解放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杜塞尔的解放哲学思想以解放和正义为轴心，起源于对拉丁美洲边缘地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被压迫剥削与异化的深刻反思，主要内容是批判现有资本主义体制下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化和种族主义的运行逻辑，强调关注被边缘化群体的需求，解放受压迫的群体，以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杜塞尔理论的外部性伦理立场和分析解释学（analytical hermeneutics）的方法论与中拉命运共同体有着深刻的价值认同，二者共同指向一种新型文明关系，即通过将解放和正义从资本逻辑中剥离，打碎西方霸权文明的统治，推动多元文明之间平等的“跨现代性”对话，从而明确中拉命运共同体对拉美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责任与积极意义。

### （一）解放哲学的伦理立场

杜塞尔解放哲学的伦理立场明确批判现有的权力结构，主张从存在于资本主义本体的“外部性”出发尊重“他性”，给予“他者”更多关注与承认。杜塞尔批判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分析方法，主张向边缘受压迫者提供有利的伦理政治选择，尊重他者的外部性，倾听他者的话语。<sup>①</sup>杜塞尔进一步指出，“他者”即主流之外的声音，其外部性和需求是揭露、抵制现代性总体化力量的前提，“倾听，而不是仅仅看到他者，是分析方法提出的伦理—政治承诺。”<sup>②</sup>

在杜塞尔看来，外部性并不特指西方现代性之外的物理空间，而是指整体性的本体论基础之外的逐渐被现代性所淡化甚至排除的领域。杜塞尔强调，外部性与非殖民化地缘政治的具体历史实践相结合，并在这种实践中得到自我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外部性不仅是理论上的概念，更是社会斗争中现实、知识和实践的具体表现。“外部性只因为人类自由的存在而真实……在这里，人的纯粹自然实体性获得了其所有的独特性、其应有的不确定性、其承载历史和文化的本质；它是一种自由而负责任地决定自身的存在；它是人，是面孔，是神秘。”<sup>③</sup>杜塞尔指出，“他性”也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在历史上、象征上和物质上被殖民化、被剥削、被种族化、被非人化和被贬低的实体。针对他性与外部性的论述阐明了解放哲学伦理立场上的“跨本体论”意识。

杜塞尔的外部性概念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与卢卡奇（György Lukács）、科西克（Karel Kosík）或布洛赫（Ernst Bloch）等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相反，杜塞尔认为外部性而非总体性才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键。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谈到德国解放问题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与现行普遍秩序即当前已确立的“总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无产阶级当下受这个总体的绝对统治；另一方面，它又是这个总体的绝对对立面。它体现了一种超越既定与主导世界领域的“肯定性”之内在矛盾。<sup>④</sup>

<sup>①</sup> Enrique Dussel,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5, p. 175.

<sup>②</sup> Jairo Fúnez-Flores, “Decolonial and Ontological Challenges in Social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Vol. 39, No. 6, 2022, pp. 21-41.

<sup>③</sup> Enrique Dussel,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5, p. 158.

<sup>④</sup> Enrique Dussel,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63*,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41.

杜塞尔将总体性理解为资本和资本家，而无产阶级则是完全对立于总体之外的外部性范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了活劳动与外部性的关联，指出“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因而这种劳动人每天都可能由他的充实的无沦为绝对的无，沦为他的社会的从而也是现实的非存在”<sup>①</sup>。换言之，在超越资本的总体性领域的意义上，任何不现实地为资本而劳动的人都是“外部性的”，是“充实的无”。劳动主体一旦作为雇佣劳动者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时，就从独立的人转变为“绝对的无”，失去了自主性和人性，最终沦为一个个被资本异化、贩卖、否定的个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sup>②</sup>杜塞尔认为，马克思的这几段论述论证了资本存在的“超总体性”范畴——“一切都始于活劳动的外部性”，马克思反复谈到创造价值源泉的外部性。对这种外部性的强调，对劳动者（尽管实际上作为雇佣劳动已被资本所纳含）真正“他者”的肯定，正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支点。<sup>③</sup>

在这个意义上，杜塞尔强调资本的一切不同形式都可以从资本的外部性出发，并且被解释为活劳动的作用和表现形式。“对资本的本体论分析——即揭示其基础、存在的同一性，或作为其现象表现形式之根源的本质，或者说对‘自我增殖的价值’的本体论分析——只有从批判的立场（我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立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外部性是使对资本总体性进行批判的实践前提。但除此之外，这种‘外部性’或‘他者’的实在性，即非资本的存在，仍是尚未被资本完全吞并的、以其身体性存在着的活劳动者。”<sup>④</sup>

## （二）解放哲学的方法论

杜塞尔解放哲学的方法论主张采用分析解释学批判现代性的总体化话语与实践，并发展出一种基于外部性立场的话语体系。在众多拉美学者看来，西方左翼思潮中的社会批判理论仍旧不够彻底，即使是关于权力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后现代批判和社群主义哲学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以欧洲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0页。

③④ Enrique Dussel, *Towards an Unknown Marx: A Commentary on the Manuscripts of 1861 - 63*, London: Routledge, 2001, p. 245, pp. 240 - 241.

中心的。<sup>①</sup> 为了打破当下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性范畴与殖民性框架，杜塞尔在方法论上提出了一种旨在真正与现代化的单一性/客观主义和后现代的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彻底决裂的“本体论转向”——分析解释学。杜塞尔指出，分析解释学是以“肯定真实的、存在的、历史性的他者”的伦理作为出发点，并将其描述为辩证法的跨本体论时刻。杜塞尔的分析解释学方法将历史上被殖民、被排斥的思想体系放到认识论上的优先地位，反对单一认识论的本质主义，要求诠释那些被现代性无休止扩张的推力所掩盖的地区、民族、历史、斗争和哲学。其解放哲学使非殖民主义学者能够从外部性的伦理和地缘政治的立场来思考、行动并重新解释世界。

杜塞尔的分析解释学强调来自外部性社会多维度的解放。杜塞尔认为，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更是文化和思想上的自主。在这个意义上，解放不仅意味着摆脱外部的压迫和控制，更意味着实现内在的自主和自我解放。内在的自主与自我解放在杜塞尔看来是“跨现代”的<sup>②</sup>，它超越了后现代仍然以欧洲为中心的视野盲点，代表着对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多重否定，“战胜怀疑人性的经营理性（全球管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大男子主义（色情文化）、白种人的统治（种族主义）和破坏自然（生态学），是解放各种被压抑、被排斥类群的先决条件。”<sup>③</sup>

杜塞尔的分析解释学以跨文化对话为切入点，从全球性视角而非欧洲中心主义的地方性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历史。一方面，杜塞尔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地方性统治视角将导致一种霸权哲学，即通过统治的视角重新思考世界过程的成果，“它没有试图表达真正的全球经验，更没有从那些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人的角度进行反思；相反，它陷入了一种声称具有普遍性（通过否定其他文化的特殊性）的区域视角。”<sup>④</sup> 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这种统治视角下的经验性局限，杜塞尔提出了一种以他性为核心的解放哲学，即关注被主流

<sup>①</sup> Walter D.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xiv.

<sup>②</sup> Enrique Dussel, *Beyond Philosophy: Ethics, History, Marxism, and Liberation Theology*,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p. 68.

<sup>③</sup>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编，马丁译：《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sup>④</sup> Enrique Dussel, *Ethics of Libe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2.

现代性边缘化群体的全球性视角。“解放哲学是一种反话语，一种诞生于边缘（从受害者和被排斥者的角度）的批判哲学，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作用。它明确意识到自己的边缘性和被排斥性，但与此同时，它也有意致力于拥抱和参与整个世界的复杂性。”<sup>①</sup> 杜塞尔希望通过跨文化对话打破西方霸权，使非西方的文化、知识以及价值观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交流与学习，以此维护各个共同体或民族文化的可变性及差异性，肯定那些被现代性所忽视的传统文化价值。

## 二 拉美“殖民性”研究的共同体结构“去殖民化”

“殖民性”批判理论由秘鲁社会学家、人文主义思想家阿尼巴尔·基哈诺提出，该理论深入探讨了拉美社会结构中种族、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本质及其历史渊源。基哈诺批判性地审视了拉美地区的殖民历史——这种历史遗产通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领域持续施加影响，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动态，并最终加剧了拉美社会的系统性不平等。

基哈诺批判 21 世纪初的全球化，认为它是由美欧主导、以殖民性国家为中心，象征着现代资本主义登临全球强权巅峰。这一过程伴随强烈的殖民性特征，而这种权力模式的基本轴心之一便是“一种围绕种族观念对世界人口进行社会分类的心理建构，它压抑了殖民统治的基本经验，并渗透到全球权力更重要的层面，包括其特殊的合理性：欧洲中心主义。种族轴心具有殖民主义的起源和特征，但事实证明，它比殖民主义更持久、更稳定。因此，当今全球霸权的权力模式是以殖民主义因素为前提的”<sup>②</sup>。在基哈诺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物质或主观经验的模式，是新世界权力体系全球性体验的表现。但它背后的理性却是欧洲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现代性是殖民世界或资本主义欧洲中心视角的体现。<sup>③</sup>

针对现代性发展的殖民性视角，基哈诺提出了三个原创性概念，分别为

---

<sup>①</sup> Enrique Dussel, *Ethics of Libe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47.

<sup>②</sup> Aníbal Quijano and Michael Ennis, “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 in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Vol. 1, No. 3, 2000, pp. 533 – 580.

<sup>③</sup> Aníbal Quijano, “¡Qué tal Raza!”, en *Revista del CESLA International Latin American Studies Review*, No. 1, 2000, pp. 192 – 200.

“殖民性”“权力的殖民性”及“殖民主义权力矩阵”。这三个概念全面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不平等结构及其历史性根源。基哈诺认为，这三个概念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对“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知识体系与自然科学中的“理性神话”提出质疑，实现了对现代世界体系中西方国家残留的殖民遗产的批判性分析，共同构成了挑战全球权力、重塑共同体结构的重要理论框架。基哈诺所搭建的“殖民性—权力的殖民性—殖民主义权力矩阵”批判框架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形成了深刻互构：一方面，基哈诺的批判理论通过揭露拉美地区的殖民性现实，明确了中拉命运共同体需应对的核心议题与挑战；另一方面，中拉命运共同体通过推动拉美经济主权与知识生产主体性，为拉美地区突破“殖民主义权力矩阵”提供现实动力。

殖民性是基哈诺理论的核心概念，是权力的殖民性与殖民主义权力矩阵的基础。“殖民性”一词揭露了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持续存在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本质，指明了殖民统治在形式上结束后，殖民关系和结构在现代社会中依然根深蒂固并持续产生影响的现实。基哈诺认为，殖民性不仅仅是一种历史遗留现象，更是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一个构成性维度；它不仅局限于经济和政治领域，还包括文化、知识生产和日常生活等方面。基哈诺关于殖民性的论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不平等结构根深蒂固的原因，即源于殖民时期延续并通过种族、性别和文化的等级制度维持、再生产并进一步巩固。

权力的殖民性是殖民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指的是通过种族划分和社会分类体系来维持和重建全球权力结构的机制，它揭示了现代世界体系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根源。基哈诺认为，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权力的殖民性，这种权力关系形成于殖民时期，通过以种族、劳动力、性别和知识等多方面因素为载体而持续存在。权力的殖民性意味着围绕种族概念的世界人口的基本社会分类作为统治和剥削整个星球的关键工具，出现在殖民时期并成为现代世界体系的构成要素。<sup>①</sup> 权力的殖民性显示了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互为交织的关系，揭示了种族分类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基哈诺明确提到，“种族作为现代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 and 结果，渗透进资本主义世界权力的各个领域。换言之，殖民性是资本主义、殖民/现代和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

<sup>①</sup>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 Vol. 21, No. 2 - 3, 2007, pp. 168 - 178.

权力格局的基石。”<sup>①</sup>一方面，殖民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快速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基哈诺认为，殖民主义不仅是欧洲对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物质征服，还涉及一种全新的社会分类和劳动体系的建立，例如，欧洲殖民者将非洲奴隶纳入种植园经济体系，强迫美洲原住民从事矿山劳动，等等。这种分类体系基于种族和种族化的劳动分工，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殖民主义时期建立的种族化分类和劳动体系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得到延续并进一步强化，持续影响着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与社会结构，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平。

殖民主义权力矩阵是权力的殖民性的理论框架，将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加以结构化、系统化。它是由殖民性构建的多维度权力体系，描述了一种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性别和种族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来维持和再生产的全球不平等结构，体现了殖民性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渗透与再生产。基哈诺指出，殖民主义权力矩阵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结构，这个矩阵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重和多面管理及控制的霸权结构。“它的历史深度至少跨越五个世纪，维度涵盖全球范围。”<sup>②</sup>在基哈诺看来，这个矩阵不仅在殖民时期形成，并且在后殖民时期继续发挥着作用，确保了“欧洲中心主义”在世界权力体系中的持续影响与统治地位。

基哈诺认为，殖民主义权力矩阵主要包括经济控制、权威控制、性别和性控制、主体性和知识控制。<sup>③</sup>这四个维度共同构成了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基础结构。表1总结了每个维度的具体内容、特征与实例。其中，经济控制是殖民性的基础，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土地掠夺、劳动剥削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实现经济上对其他国家的支配。权威控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维持其霸权统治地位的强制性暴力手段。性别和性控制是殖民主义、资本主义以及父权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们共同推动了男权至上，而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塑造了现代社会中的性别剥削关系。最后，主体性和知识控制是资本主义在上层领域实施操控的手段，它通过控制知识生

<sup>①</sup> Aníbal Quijano, “¡Qué tal Raza!”, en *Revista del CESLA International Latin American Studies Review*, No. 1, 2000, pp. 192 – 200.

<sup>②</sup> Aníbal Quijano, “Coloniality and Modernity/Rationality”, in *Cultural Studies*, Vol. 21, No. 2 – 3, 2007, pp. 168 – 178.

<sup>③</sup> Walter D. Mignolo, “Introduction: Coloniality of Power and Decolonial Thinking”, in *Cultural Studies*, Vol. 21, No. 2 – 3, 2007, pp. 155 – 167.

产与传播来强化其霸权地位，塑造被殖民者的世界观和自我认知，从而延续殖民时代的文化和思想支配。

表 1 殖民主义权力矩阵

维度	内涵	实质	特征	实例
经济控制	土地掠夺、劳动剥削、自然资源控制	基于种族分类的劳动分工体系，维持西方国家经济霸权	主导性	玻利维亚银矿开采，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
权威控制	政治和行政权力的集中，包括对制度、军队和警察的控制	维持社会秩序和殖民统治	暴力性 偶发性	巴拿马运河的军事控制
性别和性控制	对性别的社会角色和性行为的控制	资本主义父权制产物，规训妇女与社会再生产	社会建构性	代孕、冻卵等社会再生产商业化现象
主体性和知识控制	文化、教育和知识生产的控制	丧失原有文化主体性，塑造资本主义世界观，维护西方霸权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生产性 传播性	定居殖民者对原住民实施的文化种族灭绝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绘制。

根据基哈诺的深刻洞察，拉美社会受全球帝国主义体系影响，其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不仅植根于政治、经济上与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更深刻地体现在内嵌于社会关系和文化历史的殖民性权力结构中。基哈诺强调，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着由全球权力体系所施加的压迫与不平等境遇，这一现实迫切呼唤一种去殖民化的理论与实践框架。具体而言，这一框架旨在全面审视、批判并超越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霸权逻辑与殖民性权力残余，推动重塑拉美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更加公正合理的共同体结构，促进拉美地区与其他地区和国家在多元领域建立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新型共同体关系。其中，中国与拉美地区关系的良性发展对共同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实现拉美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重塑起到关键作用。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成功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参照，对拉美国家实现自身的去殖民化和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成为当下国际社会去殖民性的积极实践之一。

### 三 拉美“多元世界模型”的共同体价值

哥伦比亚籍人类学家阿图罗·埃斯科瓦尔是当代后发展学术话语中的代

表人物，他的思想多元激进，跨越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政治生态学、发展人类学、设计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后发展理论”“多元世界观”以及人类学新范式等先锋概念以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为核心，在对西方现代性发展话语的实践展开强烈抨击的同时探索替代发展愿景的可能路径。埃斯科瓦尔的哲学思想通过批判传统“西方中心主义”的发展观，倡导拉美地区多元化、自主化和本土化的发展路径，为社会公平正义、文化的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也为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内在价值的多元、自主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全新的视角。

作为对西方世界主导的现代性、文明模式以及世界构造方式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埃斯科瓦尔提出的“多元世界观”是对西方主导的传统现代性发展理论的深刻批判与重构。他认为，多元世界指的是这样一种世界观“它呼应了地球的自生动力和创造力，以及任何生物都不能脱离地球而独立存在这一不争的事实”<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都生活在多元宇宙中，多元宇宙被理解为地球的生命力和生命不断运动所产生的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不断变化纠缠的过程。<sup>②</sup>在这些动态中，人类创造了特殊的世界，这些世界往往具有持久的影响，如市民社会与共同体的产生。然而，埃斯科瓦尔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中一个世界僭取了作为“世界”的权利，并试图将构成社会—自然生活的多元世界简化为自己的世界，进而通过权力的不平等排斥其他世界的价值观念，最终走向发展的对立。就像埃斯科瓦尔谈到，发展的目的论始终坚信“与完美的欧洲相比，第三世界是另类的、低等的，是人性受到限制的地区。在这个前提下，发展不断再生产出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之间的分离与间隔。”<sup>③</sup>西方现代性依赖于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文化/自然”“自我/他者”“主体/客体”和“心/身”等<sup>④</sup>，这些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世界分割为互相排斥的两部分，将非西方社会贴上“非现代性”标签并使其委身于西方现代性社会的发展模式之下，从而将西方对这些社会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暴行正当化。

---

<sup>①②</sup> Arturo Escobar, “Transiciones: A Spac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ransitions to the Pluriverse”, in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Vol. 13, No. 1, 2015, pp. 13–23.

<sup>③</sup> [美]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等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61页。

<sup>④</sup> 张磊、武塑杰：《阿图罗·埃斯科瓦尔的设计人类学思想研究》，载《艺术设计研究》，2023年第3期，第42–47页，第68页。

这种现代性对非现代性的压迫形成了被称为“单一世界的世界”<sup>①</sup>，即以西方发展路径为唯一标准答案的本体论霸权，是导致当今世界陷入结构性不可持续的根源。

在埃斯科瓦尔看来，西方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在于其单一本体论的霸权，试图将自身历史和发展经验普遍化，强加给全球各地。这种现代性发展中的本体论霸权忽视了全球多样性的事实，试图通过同质化的发展模式消解非西方区域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的多元差异，其根本目的是维护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埃斯科瓦尔认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第一世界国家、国际发展机构（以世界银行为典型）以及大型跨国公司，而其代价却由第三世界的劳动人民和生态系统承担。例如，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国内面临巨额债务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冲击，在国际上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施压，被动地采取经济自由化与私有化改革。这些改革虽意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现代化，却忽视了社会包容性、地方适应性以及环境可持续性，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贫困与失业现象，导致公共服务下滑、社会持续动荡、资源枯竭及环境恶化。与此同时，改革为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拓宽了贸易市场，促进了跨国公司在拉美地区的进一步扩张，拓宽了获取廉价资源与劳动力的渠道，最终巩固了发达国家及大型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的优势与垄断地位。

与此同时，埃斯科瓦尔始终在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通过不断发展生物技术将价值植入大自然，并通过科学手段将地球刻录进资本的事实。在埃斯科瓦尔看来，全球生产的问题化是西方经济发展二元论模式的直接结果。然而，前后现代主义的可持续发展话语建构并没有尝试解决这种二元对立，并仍在如下四个方面继续按照统治者的要求再生产自然世界：一是全球环境问题均由统治者共享的世界观所界定，对世界上所有社区具有同等强制性，国家、地区以及阶级之间在获取资源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被忽视；二是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可见性体系控制了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将视线由大工业污染者转移到贫苦农民及其落后的生产方式上；三是主流的可持续发展所表达的生态发展主义视野，实质上再生产了经济主义和发展主义的核心内容<sup>②</sup>；四是现代性发展促成了大自然向环境的转

<sup>①</sup> John Law, “What’s Wrong with a One – World World?”, i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6, No. 1, 2015, pp. 126 – 139.

<sup>②</sup> [美]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等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33页。

变，意味着由能动性实体向源于城市—工业体系的生成式自然观的转向，其实质仍是突出人作为环境缔造者的主导性地位。

在这个意义上，埃斯科瓦尔倡导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创新，通过话语和文化的积累对自然和历史相互刻写，以此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范化逻辑抗争。事实上，许多拉美国家在现代性发展的过程中已开始寻求各类向多元化转型的话语与实践尝试。在文化领域，拉美国家开始重视本土知识系统和传统文化的重建与复兴，促进文化多样性的肯定与推广。在生态领域，许多国家开始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路径，推动本土生态智慧与生态实践的复兴，促进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例如，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将“美好生活”写进宪法，践行自然和谐共生、尊重生命平衡、追求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念。厄瓜多尔宪法还宣告了“自然拥有权利”思想，为自然赋予权利，即帕查玛玛理念（“大地母亲”），意在正面对抗现代和殖民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本体论假设——人类与非人类的割裂，标志着现代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向承认自然主体性的转向。

基于对西方现代化发展逻辑的批判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发展多元转型的实践推动，尤其是受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宣言——“一个容纳万千世界的宇宙”的直接启发，埃斯科瓦尔正式提出了“多元世界”的发展观，用以概括非二元关系本体论主导下的转型愿景。作为“后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多元世界的诞生不仅奏响了二元本体论主导下作为自由主义秩序基石的单一世界霸权的挽歌，更是埃斯科瓦尔本人所描绘的一种多元、包容、共存、自治、和平与正义等理想现代社会的投射。

埃斯科瓦尔提出的“过渡模型”作为多元世界的理论框架，代表着一个研究和向多元世界过渡的空间，具有独特的多元性、自主性以及本土化特征。过渡模型的产生与发展基于“单一世界的世界”对本体论占领的思考，而埃斯科瓦尔则希望通过该模型实现发展的多元状态，即“在星球范围内实现多个世界”的可能。<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过渡模型被应用于理解和分析不同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下从一元向多元转型的过程。首先，该模型认为多元世界应当具有多元性和自主性特征。现代化进程不应该被简化为单一的、线性的发展路径，而是应当考虑每个社会和文化独特的历史、经验和发展需求。例如，

---

<sup>①</sup> Arturo Escobar, “Transiciones: A Space for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ransitions to the Pluriverse”, in *Design Philosophy Papers*, Vol. 13, No. 1, 2015, pp. 13–23.

拉美地区不同国家和社群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展现出了多样的社会创新和发展模式。其次，埃斯科瓦尔指出，这种多元性反映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自主选择 and 应对策略，要基于社群自身需求和文化背景自主地实践发展路径。他指出自主性在构建更加公正、可持续的社会结构方面起到的推动性作用，并明确了其在全球化语境中能够使不同社会保持独特性和文化身份的功能。最后，该模型强调了本土知识和实践在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提倡从拉美地区底层社群开始的、基于当地需求和文化背景的发展策略，以增强社区的本土性特色和个体的自治能力。埃斯科瓦尔以萨帕塔主义为例，主张应首先通过实现饮食、学习、治疗、居住等社会生活关键领域的去殖民化，从而“自下而上”地实现自主性。<sup>①</sup> 自治旨在为社会生活建立新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埃斯科瓦尔认为应提倡一种“为自治而设计”的人类学取向，强调以地方社区和社会运动为中心抵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抗争思维，从而反映来自本土底层社群自下而上的去殖民化努力。<sup>②</sup>

#### 四 拉美马克思主义“跨本体论”转向与中拉命运共同体互构

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根植于双方作为世界新兴经济体共同的价值驱动，也是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现实要求。2014年7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首次提出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倡议，这一理念以“五位一体”新格局为核心，涵盖政治互信、经贸共赢、人文互鉴、国际协作和整体合作五大维度，并通过“1+3+6”新的合作框架，从“一个规划、三大引擎、六大领域”着手推动其实践。<sup>③</sup> 十年来，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双边政治关系不断加强，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呈现多元发展。中拉命运共同体以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多元对话与合作共赢超越了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与本体论霸权，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的解放逻辑，又融合了中国式现代化经验与拉美本土发展的诉求，在现实层

<sup>①</sup> Arturo Escobar, *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74.

<sup>②</sup> Arturo Escobar, “Autonomous Design and the Emergent Transnational Critical Design Studies Field”, in *Strategic Design Research Journal*, Vol. 11, No. 2, 2018, pp. 139–146.

<sup>③</sup> 习近平：《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第2版。

面反映出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范式转向。

以杜塞尔、基哈诺和埃斯科瓦尔为代表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学者通过理论的跨本体论与非殖民化转向，为重新审视现代性和权力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秉持的平等互利理念和正确义利观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一方面，拉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与特征深度契合了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归，揭示了中拉命运共同体对传统共同体结构的超越；另一方面，中拉命运共同体为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跨本体论与非殖民化实践提供物质基础，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拉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现实效应。拉美马克思主义跨本体论转向蕴含着鲜明的多元性、动态性、关系性和实践性特征，其与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互构关系对准确把握和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促进中拉关系发展、携手助力全球南方振兴与世界多极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拉美马克思主义“跨本体论”的多元性特征主张重新审视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因此应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认同，构建基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中拉命运共同体。

杜塞尔解放哲学的外部性视角将“存在”视为包括所有被传统本体论排除在外的存在者，即被压迫和边缘化的群体。这一观点直接挑战了现代性主流本体论的内在性假设。杜塞尔的外部性视角强调对话和承认的必要性，主张共同体的构建必须关注并纳入边缘化群体的独特经验和需求。杜塞尔认为，真正的共同体必须基于平等对话和相互认同，而不是对立观念下的单方面同化或支配。杜塞尔指出，“承认欧洲之外的其他现代性话语的尊严，是解放伦理学力图使之成为不可避免的、可见的和强制性的实际任务。承认他者的话语，承认被压迫和被排斥的受害者的话语，实际上是伦理进程的第一个构成性时刻，而伦理进程是进行哲学解放所必需的。”<sup>①</sup>通过平等对话和相互认同，杜塞尔主张构建一个尊重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全球共同体，为边缘化群体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支持。

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多元性的价值尤为凸显。中拉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推动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跨文化沟通，以开放、尊重、理解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文化背景是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基础。2016年，

---

<sup>①</sup> Enrique Dussel, *Ethics of Libe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52.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时曾指出，“我们应该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继续深化中拉文化对话，让文明互鉴成为增进中拉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推动世界和平的纽带。”<sup>①</sup> 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为构建基于多样性和包容性的中拉命运共同体指出了方向。首先，应当摒弃以西方为中心的单一发展路径，重新审视和批判性吸收现代性发展模式的经验教训，同时尊重中国与拉美国家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其次，通过中拉双方的平等对话和相互认同，构建多元包容的命运共同体，确保每个国家和群体的声音都能被尊重。这不仅有助于深入推动中拉关系的发展，更凸显了中拉双方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与社会多样性的认同与尊重，共同为全球和平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第二，拉美马克思主义“跨本体论”的动态性特征批判了现代性中的僵化线性逻辑，因此应以流动的视角重新审视全球化下的权力关系及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基哈诺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发展逻辑，认为其导致“线性和单向的进化论与历史二元论视角矛盾地融合，从而使其变成一种扭曲的视角，除了错误之外，别无他用”<sup>②</sup>。与此同时，基哈诺在其关于殖民性和权力矩阵的研究中强调了社会结构的动态性。基哈诺指出，现代性中的权力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动态演化的；殖民性不仅仅是过去的遗留，它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它嵌入在现代性的每一个层面。这种动态性不仅体现在权力关系的变化上，也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文化关系的不断演变中。它不仅强调了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过程性，同时要求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摒弃固定的共同体结构与发展模式，以流动和发展的眼光审视中拉关系的动态变化，灵活认识并应对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背景下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及时抓住发展机遇。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中拉关系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应该登高望远、与时俱进，巩固传统友谊，加强全方位交往，提高合作水平，推动中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实现新的更大发展。”<sup>③</sup> 近年

<sup>①</sup>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秘鲁总统库琴斯基夫妇共同出席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并参观“天涯若比邻—华夏瑰宝展”》，载《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3日第1版。

<sup>②</sup> Anibal Quijano and Michael Ennis, “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Latin America”, in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Vol. 1, No. 3, 2000, pp. 533 – 580.

<sup>③</sup> 习近平：《促进共同发展 共创美好未来》，载《人民日报》2013年6月7日第2版。

来，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中拉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从经贸合作到人文交流，从基础设施建设到科技创新合作，双方关系日益紧密且多元化。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只有顺应时代不断适应和调整，才能确保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第三，拉美马克思主义“跨本体论”的关系性特征是对“西方中心主义”本体论二元对立观念的直接反驳，强调不同存在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因此应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内部多维、复杂的社会关系模型。

埃斯科瓦尔在其后发展理论中强调了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关系性的作用。他指出，后发展视角下的社会关系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而是多向的、复杂的多元宇宙，“抗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现代性的普遍实践逻辑和单一阐释语言，决定了它必然试图驯服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世界，从而抹除多元宇宙。”“世界就是多元宇宙，是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人类与非人类的相互关系之网。”<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埃斯科瓦尔提出用“星球化”概念代替当下的全球化逻辑，强调多元世界存在的必要性。这种关系性视角强调了存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互动，打破了传统本体论中的独立和分离观点。

在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中国与拉美国家作为存在的双方，这种关系性视角同样适用。2014年习总书记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发表的主旨讲话中提到，平等互利、共同发展是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要努力构建政治上真诚互信、经贸上合作共赢、人文上互学互鉴、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整体合作和双边关系相互促进的中拉关系“五位一体”新格局。<sup>②</sup>这一格局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利益交换逻辑，强调双方之间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深层关系，通过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合作体系，实现中拉关系的深度整合与协同发展。

第四，拉美马克思主义“跨本体论”的实践性特征深刻凸显了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的关切，强调理论必须服务于现实的社会变革，因此应以实际行动促进中拉双方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杜塞尔、基哈诺和埃斯科瓦尔在各自的哲学实践中都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杜塞尔在解放哲学中提出，哲学不应仅停留于理论层面，而应成为指导

<sup>①</sup> [美]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汪淳玉等译：《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第二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24页。

<sup>②</sup> 习近平：《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载《人民日报》2014年7月19日第2版。

实践的强大力量。因此，解放哲学的核心在于其实践性，它不仅是对现实的反思，更是对现实的改变。基哈诺在其关于殖民性和权力的研究中也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通过具体的行动才能打破不合理的权力结构，推动社会的正向发展。埃斯科瓦尔在其后发展理论中，更是强调了实践对于实现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实践性强调了理论与实际行动之间的紧密联系，进一步凸显了跨本体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同样需要实践性的指导。这不仅要求中拉双方在理论上达成共识，更需要在行动上付诸实践，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合作项目和政策措施推动双方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这些实践活动也将为中拉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双方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 五 结语

中拉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殖民化”与“跨本体论”范式转型的现实映射，它通过合作共赢原则，超越了西方单一发展模式的垄断。中拉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合作共赢双边关系与拉美马克思主义“外部性—去殖民性—多元化”的理论框架高度吻合，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的零和逻辑，不仅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间的协同发展、共同进步提供了宝贵的南南合作范例，更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了深刻的中拉智慧。

(责任编辑 徐 睿)